

高伯球

個人簡介

1928 年生於廣東花縣。八歲隨搶救隊到韶關，加入兒童團，後入讀兒教院第二院和第四院。約兩年後，入讀培德小學，不久離校，暫居樂昌。和平後，赴港尋親，後再回樂昌生活。1949 年後，回港生活。

童年生活

日本仔來的時候，我八歲，還沒有讀書。當時日本仔先到花縣，再經廣州前往獅嶺。當時我們很淒涼，沒有吃的。花縣很窮，村子又大，有幾百人。後來搶救隊到白石村，¹ 他們問村長：「日本人打來了，你們村子裡的兒童要不要疏散去韶關？」當時我沒有問母親，便跟著搶救隊走了。弟弟留在家裡，沒有和我一起走。家人晚上找我的時候，村裡人告知我已跟搶救隊去了韶關。小時候，我膽子真大，六、七歲就到處走，如替家人送禮給親戚。那時鄉下人很有禮貌，每年都要送餅和鹹肉粽給外婆。

隨搶救隊到韶關

記得那時我們村裡有數十人去了兒教院，以我年紀最小。因為年紀太小，搶救隊起初不讓我去，但我一路跟著，後來就讓我跟著去。那時候，我不知道去韶關做甚麼，只知道那裡有飯吃。搶救隊的姑娘，多為中專生或大學生，一路帶著我們從花縣走到韶關。

我們一路坐船，從國泰、清遠到石角，花了七天才到韶關。那些船是用人拉的，北江水很急，五、六個船家就用大纜來拉船。我們沿途有飯吃，三餐都吃魚。晚上睡在船

¹ 搶救隊由廣東省振濟委員會及有關單位派人組成，隊員深入戰區，在不同地方建立難童收容所。隊員亦需冒著戰火，深入敵後，說服難童，或勸導難童家人，使孩子自願進入收容所。搶救隊隊員帶領孩子跋山涉水，掩護他們越過敵軍封鎖線，從南海、順德、番禺、中山、台山、新會、開平、恩平、鶴山、花縣、三水、清遠、四會、湛江、潮汕等地，護送至粵北後方。見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編輯組：《烽火歲月的豐碑——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回憶錄》，1995 年，頁 10-11；和吳菊芳：《粵北會戰中的婦女動員——廣東新運婦女會擔負了這種責任》，《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彙編 1937 年-1945 年》，1988 年，頁 317-318。

上。我年紀最小，有時候會哭，搶救隊的大姐姐便哄我，叫我不要哭。離開家鄉時，我沒有回家收拾行李，什麼都沒有帶，也沒有和小朋友們道別，便隻身跟著搶救隊走了。

到了韶關，我們先在西河壩上岸，記得那裡有間西河醫院；然後便去省政府，在那裡逗留一晚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們出發去犁市墟仁村。那時的兒教院，叫兒童團，還未正名為兒童教養院。我們花縣去兒教院的小朋友最多，約有一百多人，四會則排第二。²

兒童團

初到兒教院，我加入了兒童團。香港有些華僑來到韶關，見到我們便說：「訓練這些小朋友沒有甚麼用，應該讓他們讀書。」於是找了老師來教我們，那些老師是廣州中專生和大學生。我們在戶外搭起樹皮屋，每人一張凳子，老師教我們唱歌、寫字。早上六點院方吹號，我們起床後便去河邊洗臉，那時洗澡也在河邊，當然沒有熱水，只有冷水。洗臉後，我們便吃粥和做早操，接著背書包去樹林讀書和唱歌。記得第一期的學生，戴著童軍帽，上面還有兒童團的徽章。我們也繫領帶，小腿上綁上帶子，就像軍人那樣。那時藥物非常缺乏，我和部分同學試過發雞盲，³晚上看不見東西。醫生讓染病的同學吃豬肝，一人一碟，那時候我們營養不足，豬肝較有營養。

我在兒童團的時候，吳菊芳的女兒李湏還很小，和我年紀差不多吧。有一次，吳菊芳身穿長衫，來兒童團看我們，她見到李湏和我們一起，便對她說：「湏，回來吧，別和那些小朋友玩。」當時她們家外面，有兩個衛兵駐守。至於兒童團的同學，我記得高奇，他跟我們同期，曾任民政廳廳長，現居廣州。

第二院

我們在兒童團的時間很短，第一期只有幾十人，後來人漸多，便遷去連縣新成立的

² 四會位於廣東省西部，為肇慶市下屬的一個縣級市。

³ 發雞盲為廣東俗語，指雀目病，症狀為在暗處或夜間視物不清。

第二院。第二院位於連縣三江墟的龍咀。我們從韶關乘車，一路往坪石走，再從坪石向西步行至連縣，最後到達三江墟的龍咀。第二院的院主任是黎英女士，他弟弟叫黎傑，是第四院的院主任。當時兒教院很多導師都是女性，我還記得第二院有個女導師叫司徒英。

在二院的時候，我們六點起床，去河邊洗面，然後吃粥、做體操和上課。中午十二時吃午飯，由伙伙負責煮飯。飯後，我們午睡一小時，然後上學。晚上聽講座，大約九時關燈睡覺，生活很有規律。二院的讀書環境很好，比較安靜。在樹皮屋裡，每人都有一本教科書。上課時，和同桌一起頂著一塊板當書桌。我們在上面看書和做功課，那時我們紀律不錯，很有禮貌，東西也擺放得很整齊。此外，我們每個禮拜都要報數，不可以出錯。報數是這樣的，我們按高度，從高至矮的順序排隊，每排有十四人，我們輪流叫出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這樣就知道人是否到齊了。禮拜一是紀念週，導師長官都會講話，教訓我們，說：「將來你們是國家的主人翁和國家的棟樑……」那時老師真的很用心教書。到了禮拜日便放假，同學會弄點野果一起吃。

我在二院住了一年多，有一段時間腦膜炎肆虐，情況非常嚴重，有百多個小朋友死了。那時我們停課，老師要我們戴口罩，在地上撒石灰粉，但藥物卻很缺乏。

第四院

我後來轉去連縣保安福山寺的第四院，轉院的原因，我已不太清楚了。記得是老師叫我們去，我們就去了。那時是走路去的，我先把一塊布摺成包袱，後將一個軍用袋、一個漱口盅和一支牙刷裝在裡面。我背著包袱便去四院了，那時轉去四院的，約有數百個小孩。

四院不太大，周圍都是樹林，空氣很好，環境優美。我們去四院時，那裡已經有學生，約數百人，我們是新加入的。四院和二院的作息時間也差不多，不過伙食較差。在

讀書方面，四院的科目有政治科、文化科等，課本跟二院不同。四院教科書的文字也變成橫排，而二院實施舊制度，有國語科，課本也是線裝的。

我在四院住了約兩年，和雷啟添最熟。我平時叫他「雷小姐」，這是同學為他起的別名。幾十年後，我們再聯絡，每次打電話給他，他說：「高伯球，你還記得我的名字，你還記得我是『雷小姐』。」退休前，他當老師，現居開平，時常邀請我去玩。至於其他同學，很多已經忘記了。至於導師，一個叫宋麗芳，一個叫范志良，教體育的。我在四院時，見過吳菊芳。那次她來福山巡視四院，同學們為了歡迎她，等了幾小時，她身邊還有幾個衛兵跟著。

培德小學

我不久又從四院被調到坪石的培德小學。當時培德小學的同學，一般較頑皮和難管教，大多讀書不成，由老師選出來轉過去的。那時我比較頑皮，經常滿山跑，又去捉魚和打架。鄉下的番薯長在河邊，我們就去挖沙堆來煨番薯吃。鄉下人見到就罵我們「打靶仔」，⁴幸好鄉長幫我們開脫，說：「你們不要打小朋友，他們是難區來的小朋友，千萬不要打他們。」於是，村民便放過我們。

那時老師選我去培德，一起去的還有四、五十位同學。那時培德小學在羅家渡，我們一起從連縣走路去，走了幾天才到。培德校舍由一位有錢人的房屋改建而成，聽說有鬼，於是有錢人一家不敢住，便把它給了兒教院。培德小學學生不多，約有兩百人，沒有女生。這間學校和二院、四院不同，不用讀書，只須勞動，還要自己當伙伕做飯。所以，培德的生活很艱苦，我和同學也不大熟，所以很快便想離開。

數月後，我便逃走了。當時我和另一位小朋友一起坐霸王車，從羅家渡回到韶關。韶關公安局收留了我們幾天，把我們照顧得很好。但我們不敢回兒教院，就再坐霸王車

⁴ 打靶仔為廣東俗語，即咒人該死。

返回樂昌，在樂昌替人做幫工。後來當地的王老太收養了我，我住在那裡差不多十年。至於另一位同學，他去了馬壩，當了別人的養子。

樂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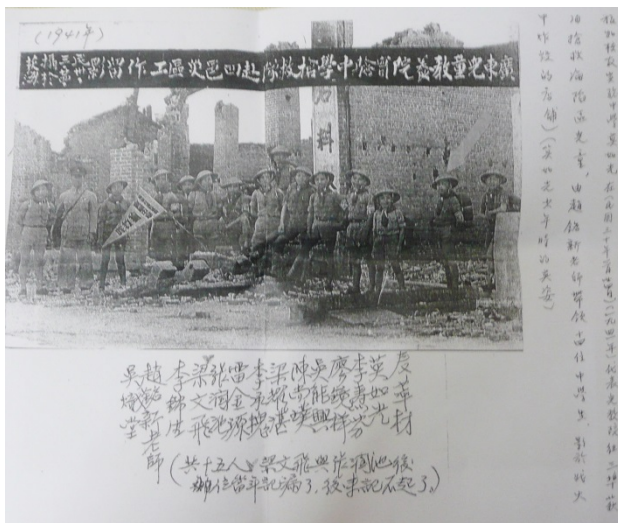
在樂昌的時候，主要幫王老太看牛和耕田，有地方住，也有飯吃。廖承志曾在樂昌北鄉上松村的山邊興建學校，建得很漂亮。學校是樹皮屋，廣州的有錢人逃到樂昌時，就在那裡讀書。後來日本人打到樂昌，學校就疏散學生去重慶。學生走了，當地人問我是否離開，我說不走。老人家很好，收留了我，於是我便留在樂昌生活。

和平後，我重遇范志良老師，那時他替人畫年畫。他幫我寫了一封信，寄回鄉下。後來我回到家鄉，打聽家人的消息，得知他們原來已經去了香港。有人給了我一個地址，叫我去找找。於是，我到了香港，聯絡上大哥、媽媽和弟弟。

數個月後，我沒有工作，於是母親給我十多塊錢，我又回到樂昌。直到 1949 年，解放後的三個月，我才重回香港。解放後，收養我的那兩位老奶奶，被政府沒收了田地。她們是中農，有幾畝田。那時她們的田地已經沒有了，我也離開樂昌。現在我還不時寄東西回樂昌，並幫助當地的教育發展和開辦老人院。



高伯球 (2014)



高先生珍藏 1941 年兒教院照片



高先生回樂昌助學